

中国水利史研究路径选择与景观视角^{*}

耿 金

【提要】 中国水利史研究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划分为以水利工程为核心的水利技术史、以人为中心的水利社会史、水利政治史及以环境为核心的水利生态史。水利技术史侧重对水利工程的技术史考察;水利政治史、水利社会史以水利切入,探讨国家在治水中的政治考量以及地域社会关系;水利生态史则将水利史与生态学、环境史交融,探讨水利工程与区域水文、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不同研究路径呈现出水利史研究的不同范式,代表性成果也比较突出,但研究范式化容易将细节问题价值同质化。当前水利史研究需要更多呈现水利背后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景观史介入是更新中国水利史研究视野与路径的极好尝试,这一视角回归关注水利史研究本体“水利”,并以水利为核心展示“景观”之变化。

【关键词】 水利史 路径 方法 景观史

中国水利史研究内容庞杂,但主流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水利工程技术为核心的水利技术史、以人为中心的水利政治史、社会史和以环境为核心的水利生态史(环境史)研究等范式。路径选择不同,研究关注的重点也有差异,但不同路径共同在水利史主题下深化各自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细化,已有路径也面临范式固化,诸多具体研究大多可在已有范式中找到逻辑归属,制约着水利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已有路径基础上,需要介入新视角,拓展研究路径。

历史地理学一直关注景观,注重探讨各个历史时期景观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景观变迁的社会和自然因素。^① 由于景观概念涵盖人与自然互动关系,近些年也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选题。目前史学界与水相关的景观史研究,或以历史水域景观为研究对象,^②或以农田景观的形成与演变为研究对象,^③水利作用与地位不突出。本文希望能从水利角度思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叠加、融合过程,考察区域环境、社会、文化变迁内在动力。在系统梳理水利史研究的路径选择及其发展过程基础上,思考水利对区域景观的塑造功能及水利在景观形成中的作用与意义。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20世纪云南水田演变与生态景观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CZS066)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良、蓝勇《中国历史景观地理研究回顾与前瞻》,《光明日报》2013年2月20日第11版。

② 如安介生对湖州地区水域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的分析与探讨,参见安介生《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③ 如王建革对江南地区农田景观演变背后折射的农田耕作制度、水文环境变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参见王建革《宋元时期吴淞江圩田区的耕作制与农田景观》,《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史林》2010年第4期《水文、稻作、景观与江南生态文明的历史经验》,《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19—20世纪江南田野景观变迁与文化生态》,《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

一、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路径选择与范式困境

水利史内涵如何界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且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水利史的外延也在扩大。郑肇经是近代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其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水利史》中将历史时期治理大江大河、修筑人工河渠、农业灌溉、抵御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围绕水利而形成的国家制度设计(书中专指水利职官)等视为水利史研究对象。^①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是中国水利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也没有直接定义“水利史”概念,只指出水利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水利各部门的历史,如防洪治河、农田水利、航运工程、城市水利、水能利用、水利机具以及有关文献、人物等等。各部门发展阶段不尽相同,综合分期应当有主次,古代水利以防洪治河、农田水利、航运工程三者为主。”^②即他主要关注历史上的防洪治洪、农田水利与航运工程,当然也涉及其他人类水利行为,以及围绕此行为而形成的技术、思想乃至文献以及人物等内容。基于此,凡从事历史时期与水利活动、水利事业相关的史学研究,皆可视作水利史研究。在研究水利本体基础上又可延伸出诸多外延问题,如在区域水利治理与分水中形成的社会问题、水利治理中的国家制度与政策问题、水利治理中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等。

(一) 以水利工程为核心的水利技术史研究

水利技术史的核心在于技术,但对“技术”的理解与定义却因人而异。总体上可以将技术理解为人所创造的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总和。^③进一步说,学术界关注的“技术”其实包含两层含义,即技术本体与技术知识。中国水利史研究中的“技术”主要是指历史时期以人力施工为主,材料上未采用混凝土等现代材料、未引入现代工程科学作为指导的农业时代的技术体系。^④而中国传统水利技术史研究不仅包括对水利工程建筑技术史的复原,还应该包括古人对水资源转换、利用及管理而形成的知识体系的总结。

可以说中国水利史研究是以水利技术史为起始的,早年的研究群体也主要来自水利科学研究单位或部门,如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水利研究室(现为水利研究所),其中以姚汉源、周魁一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开始,姚汉源用十余年时间,整理了《中国水利技术史讲义》纲要;晚年仍强调要以“历史上水利工程技术作为研究的重点”来开展自己的水利史研究。^⑤周魁一先后著有《农田水利史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等,^⑥后者分“基础学科篇”与“工程技术篇”,详细论述了历史时期治水过程中工程技术的具体环节。此后,谭徐明也在水利技术史领域有著作出版。^⑦这些水利史专著虽然也涉及社会、制度等相关问题,但多以水利工程技术为核心。此外,郑肇经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太湖水利技术史》,^⑧集中论述太湖地区的水利技术发展。其中,负责撰写太湖水系、塘浦圩田、

①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印,1993年重印。

②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③ 远德玉《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谈技术与技术史的研究》,《东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④ 张景平《丝绸之路东段传统水利技术初探——以近世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农史》2017年第2期。

⑤ 友仁《水利史研究的开拓者——访姚汉源教授》,《中国水利》1986年第4期。

⑥ 周魁一《农田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谭徐明《都江堰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

⑧ 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

溇港圩田演变部分的缪启愉,还专门撰写了《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①,虽以农田演变为中心,但太湖流域的圩田演变与水利活动关系密切,仍是一部农田水利技术史著作。

总体而言,以治黄河、长江、大运河及其他重要水利工程为中心展开的工程技术史研究,奠定了中国水利技术史的基本框架,但传统水利技术史仍有诸多问题可以深究,如水利工程修筑中的技术知识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水利知识的革新、传播过程是怎样的等问题。熊达成、郭涛编著《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概论》就将水利技术史囊括范围扩大至水利工程之外,包括中国古代水利认知中的各种基础知识(水流、泥沙运动规律、水文测验等)、水利规划思想及在历史上形成的水利名家与名著等。^②关注技术知识本身的形成、演变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维护或废弃、新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水利知识形成是古人观察水文经验与技术长期积累的结果。古代水利官员或水工通过对区域水文的多次考察获取经验总结,并经过数代之传承,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水利技术知识体系也被称为水学,是水利事业推动下理论发展的结晶。宋代是江南水学体系形成与完善的关键时期。苏轼言“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③王建革在江南水利史研究中指出,古代江南治水中形成一套完善的科学知识体系,这种治水知识在五代十国的吴越时期就积累到一定水平,吴越继唐之后,发展巩固了江南的圩田水利技术,宋以后水学实践继续得以传承。^④谢湜也指出11世纪是唐代以后江南水学真正兴起的一个时代,形成以邾亶为代表的“治田水学”及以单锷为代表的“治水水学”之争。^⑤

(二) 以人为核心的水利社会史与水利政治史研究

张俊峰对明清时期国内外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水利社会史推进的基本路径:经历了早期对魏特夫治水国家批判,以及借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分析水利与社会、水利与国家,再到之后借用宗族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宗族社区向水利社区的转变,最后通过对日本水利共同体理论的回应与质疑,完成中国水利社会史的自我超越。^⑥近年,张俊峰又提出要发掘新材料、运用多学科方法、以水为切入点进行新的综合和整体性研究。^⑦虽然水利社会史研究一直在资料搜集(向下)和理论构建(向上)上不断创新与尝试,但都难免因研究范式固化而发展受阻。

水利史研究在以人为核心的这个层面有两种趋向:一个是向下的,也就是水利社会史;一个是向上的,即水利政治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突起,很自然地就有了水利与社会史的结合,水利社会史不断“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⑧在此前,中国水利史著作中较少涉及地域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受日本学界影响较大。大致来说,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经历三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停滞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共同体理论和80年代以来的“地域社会论”。^⑨后两种理论在中国水利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共同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国内水利社会史讨论的热点。对于共同体理论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钞晓鸿已有较为

① 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熊达成、郭涛编著《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概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苏轼《禹之所以通水之法》,《苏轼文集》卷七“杂策”,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0页。

④ 王建革《宋代以来江南水灾防御中的科学与景观认知》,《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⑤ 谢湜《十一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⑥ 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⑦ 张俊峰《当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问题》,《史林》2019年第4期。

⑧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

⑨ 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系统的阐述,并对以森田明为代表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同体解体与地权关系等内容商榷质疑。^①钱杭以浙江萧山湘湖为例再论水利共同体问题,归纳出了“库域型”水利社会概念,^②其水利共同体研究建立在解构湘湖水利文献形成背后的文化与地域社会关系上,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点。

循着日本学者的水利史研究路径看,可以发现国内水利史研究除在对水利共同体理论探讨之外,也在走水利地域社会史的路子,且将这一研究的深度、广度向前推进。行龙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更重视“自下而上”的田野考察,认为“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走向田野与社会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必然逻辑”。^③他指出水利史研究应该从治水为主转向水利社会为主,本质上即强调从水利本体研究转向以水利为中心的社会研究。^④张俊峰在大量田野调查、搜集大量碑刻文献基础上讨论地域分水纠纷问题,以山西泉水开发利用中形成的地方社会为案例,提出泉域型水利社会;^⑤董晓萍等又提出“不灌而治”节水型水利社会。^⑥围绕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形成复杂的地域社会关系,而解构社会关系就成为了北方水利社会史研究的重点。总体而言,北方水利社会史研究,更多基于水资源短缺而形成的地方权力运行,以水权的争夺为核心,这种权力还包括对神灵信仰的请入及国家干预。^⑦

相比于北方对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南方对水的态度稍有不同,这主要与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有关,很多地方形成协同一致对抗水患的社会关系。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垸田社会,这种共同体以“护堤”为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因是防洪需求,与灌溉需求的水利共同体有很大不同。灌溉农业下的水利共同体表现为以“用水权”为核心,垸水利共同体表现为以“修防责任”为核心。^⑧除了江汉地区,涉及共同修堤以防御洪水的区域大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笔者研究的杭州湾南岸地区在修筑江塘抵御钱塘江潮水中,即以得利田田亩多少确定派费多寡及兴工数量,形成特定范围的“水害防御共同体”。

水利史需要关注底层社会,也要关注围绕治水而形成的上层政治史问题。本质上,政治史也是以人为核心的。从政治史角度研究水利,其实开展得比较早。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就从水利区域的划分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变迁关系出发,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将水利与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等问题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成为水利政治史研究的经典论著。^⑨西方学者魏特夫在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水利史研究中,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⑩由于水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复杂,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关注也渐趋冷淡,学界对水利政治史研究较少。近些年,和卫国以清政府对海塘水利工程的政策与行为为主线,通过水利工程透视政治史问题,以政治史视角考察水利工程的修筑。^⑪贾国静对清王朝治理黄河的研究也同样有政治史关照,^⑫表现出以治水为核心的政治史

① 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② 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读书》2012年第9期。

④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行龙、杨念群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

⑤ 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⑥ 董晓萍、蓝克利《不灌而治理——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⑦ 张景平、王忠静《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⑧ 张建民、鲁西奇主编《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⑨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⑩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⑪ 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⑫ 贾国静《水之政治:清代黄河治理的制度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研究仍具有极大活力与空间。

(三) 以环境要素为核心的水利生态史(环境史)研究

水是水利史研究的关键对象,而水的载体可以是江、河、湖泊、水库、塘坝等,河道、湖泊等历史自然环境演变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谭其骧、张修桂先生,在大量史料考订基础上,最大限度复原了历史时期河道、湖泊、海岸线等的演变过程,^①为后期水利生态史研究奠定基础。生态史(环境史)视角研究水利史有两种路径:其一,在水利史研究中介入环境因素,目的仍在解释社会变迁;其二,更注重对自然因子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社会史在自身发展中也在介入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生态史是较早被倡导要进入社会史研究的。^②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社会史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不能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背景”,而是要将生态因素视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变量。^③生态史(环境史)研究介入到水利社会史研究很快就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胡英泽以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小北干流段为空间,分析明清以来黄河河道变迁与滩地淤涨变迁对区域社会变迁的影响。^④钞晓鸿就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的水资源变化与水利关系探讨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⑤佳宏伟分析了清代汉中府以水利为中心的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⑥整体上看,北方水利史研究中介入环境变迁因素,目的仍是希望为历史上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提供生态(环境)解释,仍然属于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大范畴。

以上两种生态史研究路径在江南地区也都有呈现。冯贤亮对江南太湖、浙西地区的水利史研究,也基本延续环境史视角看地区社会变化;^⑦真正以生态构成要素展开水利史研究者以王建革为代表,其学术研究转型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目前史学界水利史研究的转型。早年对华北地区的水利史研究还关注水利社会史,^⑧近些年专注于江南地区的水环境与水利系统演变关系研究,力图通过具体的水环境变迁逐步揭示江南水利系统演变的背后驱动因素,以解析环境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⑨在其带动下,团队成员不断推出水利生态史成果。王大学在对江南海塘研究中,较早引入动植物研究视角;^⑩孙景超对吴淞江流域的潮水灌溉问题进行研究;^⑪周晴对嘉湖(嘉兴、湖州)平原水网形成过程进行探讨;^⑫耿金对浙东山会平原水利系统演变与水文生态变化关系进行研究。^⑬吴俊范从太湖以东地区低乡、高乡与滨海区的水环境差异出发,探讨河道与聚落形成的发生机制等。^⑭

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面局——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等等。

② 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社会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

③ 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 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⑥ 佳宏伟《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渠堰水利为中心》,《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⑦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 王建革《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

⑨ 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⑩ 王大学《动植物群落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

⑪ 孙景超《潮汐灌溉与江南的水利生态(10—15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⑫ 周晴《河网、湿地与蚕桑——杭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9—17世纪)》,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

⑬ 耿金《9—13世纪山会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系统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辑。

⑭ 吴俊范《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5、82页。

长江中游地区的水利生态史与江南地区有相同之处,诸如水系环境、农田制度等,但也有其区域特点。张家炎对江汉平原区的水利与环境问题研究,更强调农民对环境的感知与应对过程,关注农民的行为如何引起了环境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变化了及变化中的环境,最后这些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① 在环境史研究中,往往环境与人类活动已融为一体,环境变化影响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影响环境变迁,此二者之间在历史时期并不表现出十分对立的泾渭关系。

水利技术史是水利社会史、政治史、环境史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础,但水利技术史的研究门槛不低。老一辈水利史学家大多兼具与水利相关之自然科学知识及较好的史学功底。但随着学科不断细化,少有学者既懂水利科学知识,又愿意花大量时间在史料解读上;而史学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往往因缺专业学科知识,形成“史”与“技”的分离,这无疑是当前水利技术史之困境所在。此外,中国水利技术史研究长期致力于技术的复原与挖掘工作,容易忽略与技术同行的社会与环境。在研究内容上,在中国古代传统水利技术知识体系生成、演变与传播,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后对中国水利技术及水利工程修筑、治水、用水及区域水环境影响等方面内容,目前水利技术史研究的关注还不够。

就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诚然日本学者及国内学人将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引向更丰富的人文领域,但不可否认,水利社会史研究也逐渐进入瓶颈期,早期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在学界形成共识的一些理论框架,逐渐成为制约水利社会史向前发展的枷锁。要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演进规律,需要有理论的提升与建构;但当理论本身陷入停滞后,其所代表的学科发展也将出现困局。要进一步推进水利社会史研究,要么打破既有的理论体系,从区域实际出发,深挖以水利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要么继续介入新的学科方法,将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变得更立体、丰富。水利生态史研究受区域水文环境及文献丰富程度影响较大,要深入开展研究需有文献与生态两方面条件。

环境史研究最希望“复原”历史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的最外在表现就是“景观”变化。在对中国水利史研究路径与视野的取向中,要有对区域整体景观变化动力、过程、结果的关照,揭示一些区域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特别是一些水利在当地环境变迁、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区域。以景观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水利史研究,不仅能丰富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还能充实、深化传统的水利问题研究。

二、景观:水利史研究的另一视角

历史地理研究习惯将研究对象进行二元划分,分成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从景观的形成角度而言,却不存在完全的自然与人文分离。西方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曾过分注重区域自然现象而忽视作为地理的其他因素,为解决该矛盾,施吕特尔提出地理学的景观概念(或称景观论),认为景观是地球表面通过感官察觉到的事物,包括自然形成的和人类改造的,即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希望通过可感觉的地表整体(即景观),统一整合地理学中系统与部门(或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与人文的二元论现象。^② 从景观史的学术梳理中也可以看出,早期史学家引入景观,也是希望能克服历史地理研究中只重视对自然景观框架的关注,而未能涉及景观自身鲜活的具体内容。20世纪50年代,霍斯金斯从长时段视角,梳理英格兰景观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

① 张家炎《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1736—1949》,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② 晏昌贵、梅莉《景观与历史地理学》,《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去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地理学在景观的框架解释上做出了诸多努力,揭示地貌、天然植被等景观的基本结构,但对结构之上的人类活动及其细节特征关注不够,而历史学研究景观则是要去探讨这种景观形成的方式方法,^①即关注自然景观改变的人类活动过程,以及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文景观。20世纪70年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著《神州》一书,即将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跳出传统区域地理研究范畴,在历史长时段视野下考察中国地理景观变化过程及景观背后的人类活动。^②故以“景观”研究环境变迁,本身有对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整体性关照。近些年,国内历史地理学开始重新重视景观研究,^③并且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方向。^④应该说,景观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弹性,也为探析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关系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一) 景观与环境

目前以环境为核心开展的水利史研究,无论在方法、路径,还是研究成果上都有不少积淀。要在传统水利史研究中介入景观研究视野,需要回答景观与环境有何区别,为何要用景观概念或从景观视角研究中国水利史,否则难以说明此研究路径(或视野)之必要。

不同学科对景观(landscape)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大致可从三个层次上进行把握。第一层是美学上的景观,与“风景”同义;第二层是地理学上的理解,将景观视为地球表面气候、土壤、地貌、生物各种成分的综合体,接近生态系统或生物地理群落等术语;第三层是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的景观,指空间上不同生态系统的聚合。^⑤目前历史地理学界基本使用的是地理学层面的景观概念,而环境史则希望能在景观生态学的内涵下对“景观”进行解析。

《辞海》对“环境”的解释是围绕人群的外部世界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总和,^⑥此界定比较宽泛。环境史研究中的环境主要指除去社会属性的“人”之外的环境,强调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景观史研究也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不过这里的环境更多指可见的地表景物。可见,环境史与景观史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有交叠,一些学者很自然就将景观史视为环境史的研究范畴,并将其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根源上“景观”与“环境”有区别,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景观”包含艺术概念,而“环境”更侧重生态或地理的概念;2.“景观”概念更具体,可细化为地理区域中的可视特征。^⑦此外,从二者学术史看,环境史与景观史也并不存在先后递进关系,且景观史产生时间更早。具体而言,环境史是在环境危机下催生的历史,更关注生态过程,而景观史是建立在视觉特征基础上,不是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历史研究,与图像学、地理学紧密相连。环境的概念虽然包括景观,但是景观史并不全部包含于环境史研究中。景观史涉及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二者有共同的研究关注点,但是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同。^⑧在研究理论上,环境史在初期的研究容易走入“衰败论”逻辑陷阱,尽管近些年这种逻辑体系被逐渐抛弃;景观史研究更多只是关注不同历史时期

①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页。

② 段义孚《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 如邓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④ 如张晓虹关注声音景观,认为声音可以直接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官记忆,成为与可视的物理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同等价值的文化景观要素。参见张晓虹《倾听之道:Soundscape研究的缘起与发展》,《文汇报》2017年3月31日第W12版;《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及其演变》,《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⑤ 徐化成编著《景观生态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⑥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8页。

⑦ 杨禅农《景观与环境史》,《沈阳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⑧ 金云峰、陶楠《环境史、景观史、园林史》,《风景园林历史》2014年第8期。

景观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一个面向。因此,从这一点看,景观史与环境史明显不同。

然而,环境与景观在很多具体研究中又有等同的含义,许多研究常以“景观”指示区域的综合环境要素。在研究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涉及的环境要素种类繁多,任一种单一环境要素都不能统合区域整体环境变迁及内在生态链。因此,一些区域环境史研究会用“景观”来统呈环境(生态)要素的诸多方面。从此角度言之,“景观”一词也有生态系统的内涵。如一位美国学者阐述二战对日本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多是恶性的,但也有良性的,涉及战争期间人与自然要素的互动,如战争对日本资源消耗、战争与农药化肥使用关系、渔业资源在战争期间的修复等,共同构成了当时日本的生态“景观”格局^①,此时的景观就具有了更宽广的外延。当面对环境要素的综合分析时,西方学者乐于使用景观概念。故景观概念用于环境史研究有其优势,一是景观作为可视的地表覆盖,可聚焦研究对象;二是景观也有较为宽泛的统合生态系统诸要素涵义,能实现对区域具体与宏观的综合性研究。

(二) 水域景观与水利景观

安介生以江南嘉兴地区的水田和海塘为核心,提倡水域景观研究,指出水域景观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水域景观是基于自然地貌而划分的景观类型,以水体作为景观构成最基本要件,既包括那些由各种形态的水体独立形成的景观本身,即水体景观(landscapes of water body)或称水景(water-scapes),如河流、湖泊、池塘等,也包括那些直接与水体粘着一起的景观项目,如桥梁、圩岸、水坝、海塘等。^②该水域景观的概念囊括了以水为中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内容,对推进水域史、水利史研究都有极大价值。不过,笔者尝试将水域景观中的水利部分抽出,将研究主体转移,以水利为核心探讨景观变化。那“水利景观”应该如何界定?

大体言之,以水为中心开展的景观研究可以有三层含义:其一为水域景观,由围绕水体而形成的水域、过渡域及陆域三部分的景观构成;其二为水利景观,以水利工程的设计与景观规划为研究对象;其三为前者与后者的交叉重叠,即水利工程构建后形成新的水域景观。本文研究的水利景观概念主要是基于第三层含义而展开的论述,核心是水利工程。

水利是人类围绕水而开展的各种趋利避害行为,也包括对水的利用。“水利”一词在先秦古籍中即已出现,而水利行为在中国古人的生产生活中也开展得很早,《周礼·考工记》载“匠人为沟洫”即为农田水利“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③“沟”与“洫”都是田间水道。古人的水利行为不仅在农田中,随着人类改造与利用水的能力提升,大江大河也成为人类“水利”营造与利用对象。当然,避害也是其中重要原因,即治理江河以减少水患,治水患同时也能兼顾农业灌溉。此外,河道开凿也有人类出行交通便利的诉求。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载蜀守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飧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④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很早就发展出了这三方面的功能,用于农田灌溉、抵御灾害及改善交通。在近代西方水电技术传入后,水利的功能又扩展了发电,不过发电修筑大坝也兼具防洪、灌溉等功能。因此,可大致将传统时期的水利工

① William M. Tsutsui, “Landscapes in the Dark Valle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o. 3, 2003, pp. 294-311.

② 安介生《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③ 李文绍《周礼集传》卷六“考工记”,赵载光点校,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43页。

④ 《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点校本2016年修订本,第1697页。

程归纳为:农田水利工程、防洪治河工程、航运工程及城市水利工程。水利景观就是围绕水利工程、水利设施而形成的地表景物,以及因水利设施建构而形成的水域、陆域景观。传统时期的水利景观就可包括:以灌溉沟渠、提水设施等为中心而形成的农田灌溉型水利景观;以抵御河湖海水患灾害为核心的水利工程景观,诸如海塘、河堤、大坝等景观;以航运为目的开凿的河道景观;以保障城市用水供应、空间设计需要而修筑的城市水利景观。从工程尺度上看,水利工程可大可小,水利景观也可呈现出不同的规格,如以大型水库、运河等为核心的巨型水利景观;农田灌溉、排水而构建的中型水利景观及田间沟渠等小尺度的小型水利景观。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对自然改造能力的不断提升,水利工程的体量也在不断升级,各种巨型水利工程修建所带来的地表景观与生态系统的变化也将是革命性的。

水利工程不仅是水利设施,也是人类作用与改变地表景观的直接载体。水利景观的含义也不只是等同于水利工程景观,而是包括以水利工程为驱动因素而形成的综合性地表景观,包括在水利工程修筑中形成的新水域景观、重塑的地貌景观,以及修建的人文建筑景观等。

三、水利景观史的研究路径与意义

从景观演变视角研究地区水利工程,国内已有部分成果,主要探讨区域景观形成过程中的水利塑造过程与效果。江南从唐代开始逐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基本经济区,这种经济中心地位的取得也是在水利技术的推进与提升过程中完成的,水利不仅仅塑造了江南的水乡农业,也逐步完成了江南核心区从自然水域景观向人为构建的水网景观转变。地处杭州湾南岸的绍兴,传统时代水乡河网景观的形成,即是在水利工程的不断推进下完成的。^①在江南核心区,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乔治·B.克雷西就探讨了奉贤县境内的景观形成过程,突出海塘、运河等水利工程在当地综合性景观形成中的影响:最外围的海塘保卫着内部地势较低的农田免受潮水侵袭,在较新的堤坝内,河道呈规则的直线排列,而位于内侧深处的老堤坝内的旧土地,则呈现的是不规则图案,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塘外是大量盐场,分布着成千上万个晒盐盘。在旧堤坝内外,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聚落分布形态,甚至因堤坝内外植物生长状况的差异,房屋建筑材料也呈现明显不同。在水网工程框架下,百姓生活也围绕水利为核心的农田展开,老人看护稻田免受鸟害,孩子们照看着水牛,妇女们给庄稼除草,船夫们划着他们的小船,一群男人和男孩在操作灌溉泵。^②传统时期,这种以海塘、河网为主干的农田景观,广泛分布于滨海地区,水利工程搭建起了区域的景观框架与生活场域。

从更大空间尺度研究看,以景观演变来呈现历史时期国家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也在出现。德国学者大卫·布拉克伯恩从水文、地貌景观演变视角讲述18世纪以来德国的国家发展进程,其主旋律即为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变地貌、水文环境,实现德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在征服与改造自然过程中,修筑水利工程(诸如修建大坝等)对水环境改造及由此而带来的景观格局的变化有决定性影响。^③当然,水利在不同区域或国家中的作用与意义各有不同,对管理水、利用水十分频繁之地区,水利工程之意义就极为明显,其不仅推进了当地新的整体性景观形成,而且塑造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等。

① 耿金《13—16世纪山会平原水乡景观的形成与水利塑造》,《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

② George B. Cressey, "The Fenshsien Landscape: A Fragment of the Yangtze Delt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26, No. 3, 1936, pp. 396 -

413
③ 大卫·布拉克伯恩《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环境变迁与近现代德国的形成》,胡宗香译,卫城·远足文化2018年版。

水利景观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与路径上与环境史类似,需要借助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对历史时期水利景观的本体——水利工程展开研究,首先就需要关注水利工程学、水文学等自然科学;此外,由于水利工程或水利设施本身是基于人类活动而建造或运行的,所以也要运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具体方法上,考古学是复原历史时期的诸多水利景观的基础。借用考古学方法,通过对人类改造适宜当地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水利设施、水利遗址等进行考古复原,探索景观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内在关系,是当前景观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英国殖民者在开发新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时,很快认识到由于当地降水时空分布上的不均匀,仅仅依靠自然水流是无法获得发展的,因此殖民者在澳大利亚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包括水井、水坝和蓄水池等,这些水利活动创造了当地一系列的水资源管理景观,这种景观是自然和人文交汇作用的结果。而通过对这些水利工程的技术复原,部分还原了当地景观的变化过程与驱动因素。^①此外,将考古学与GIS技术结合,是复原部分历史水利景观的重要方法。考古学可以展现不同时期水利遗址的空间分布与形态结构,而GIS则可以重建(模型)历史时期部分自然景观结构,将此二者叠加,可直观呈现区域人地关系(人水关系)的特点和变化过程及水利景观的演变轨迹。

在研究材料的获取上,古地图有极大价值,“作为人类与物理环境的图形信息的来源,地图与景观是密切相关的,二者经常共同发展”。^②如杭州湾南岸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修筑大量海塘工程,并构筑完备水网系统,这些海塘、水网工程构成了叠加的景观呈现。在当地历史地图中海塘分布、河网走向一目了然,为呈现直观的景观变化过程提供材料依据。进入近代以后,图像拍照技术的形成,也为水利景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此外,目前可用的航拍影像,特别是前几十年的航拍影像对于研究景观变迁具有极大价值。杭州湾南岸的河道、海塘景观在20世纪60年代的影像航拍中还有大量的反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当地的地表景观格局就发生了变化,不同时间段的航拍影像图,可以清晰揭示当地水利景观的变化过程。

景观史研究为开展传统的水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历史研究置于客观连续的景观实物之上开展区域综合性分析。^③水利景观史研究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大地景观生态系统,思考水文过程,以及人类对水域环境的改造与适应,并在涉水的不同学科间建立起对接平台,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就农田水利景观史研究来说,可以部分复原传统农耕时期的水利农田景观。在当前机械化时代背景下,许多传统的水利设施,诸如灌溉旋转水车、龙骨提水车等传统农田景观中的重要元素正在消失,开展水利景观史研究可以为传统农业景观复原奠定基础。另外,对大型的水利工程为核心而形成的区域景观史研究,其研究价值更大,对水利工程修筑前后或废弃前后景观变化过程的揭示,本身即是对人与自然互动过程的展示。20世纪50年代以后修筑各种大型水利工程,围绕其形成的水利景观问题还需要作大量细致研究与挖掘工作,如三峡水利工程修筑带来长江中游地区水域景观、地貌景观的巨大变化,需要对历史时期三峡区域景观演变作长时段梳理,揭示水利工程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影响了当地环境。此外,由水利工程带来的沧海变桑田的景观变化,需给予更多关注,以沿海地区的海塘修筑与农田营建最为典型。另外,无数大小不一、分布广泛的众多水库、池塘等基层水利设

① Susan Lawrence and Peter Davies, “Learning about Landscape: Archaeology of Water Management in Colonial Victoria”, *Australian Archaeology* No. 74 2012 pp. 47-54.

② 伊恩·D·怀特《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王思思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③ 刘海龙《景观水文:一个整合、创新的水设计方向》,《中国园林》2014年第1期。

施,在维持本地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用水需求的同时,也改变了本地的地表景观,而这种景观也是当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直观的外在展现。

结 语

中国水利史研究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汗牛充栋形容不为过。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理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学术框架,并将这些独立的研究“归位”,便于在谱系指导下开展更深入研究。当然,本文所归纳与总结的路径难免有不足与疏漏,而且随着近年对水利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单纯以所谓某种路径开展研究其实很难解决研究对象中涉及的复杂问题。故而,水利史研究既要有相对明晰的路径归纳,又不能过分突出路径上的分异而造成不同学科之间交流的阻隔。比如,近年对大运河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出现诸如经济史、交通史、文化史、城市史等诸多视角下的多元成果。路径不是唯一的,关键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近年,规划学、人居环境科学等视角下推进的对传统水利研究也不断出现,通过对水利兴修与人居环境的营造、调适及治理等问题的解析,讨论水利工程与人居之间的互动与共生关系^①,为水利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总体而言,不同研究路径互相补充,共同丰富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且各自都仍具有相当活力。水利技术史研究是中国水利史体系构建中的基石,也是开展其他与水利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学界在水利工程技术史研究上投入大量精力,也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为我们廓清了中国古代重要水利工程的核心技术,但对于水利技术知识体系的研究,仍有极大空间。水利社会史拓宽了人类与水利关系的认知视域,将水利修筑、维护乃至废弃背后更复杂的人类社会实态尽情彰显,也集中显现了中国内部文化巨大差异所带来的水利社会形态的多元与复杂。水利生态史(环境史)将一直以来被水利史研究中忽视的人与自然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纳入考察视野,这无疑是中国水利史研究在新的研究层面上的极大进步。但也要看到,要想再深化中国水利史研究,不仅要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细化,还需要在研究路径与范式上有所革新。

水利兴修本质上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环境做出的趋利避害行为,人们因地制宜,改造水土环境而形成水利系统,实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也在地貌景观的塑造上留下人类活动印记。景观史介入中国水利史研究,不仅拓展了已有研究路径与视野,也深化了对象与内容,展现水利工程对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整体影响,对揭示区域环境变迁、人地关系等问题都有参照意义。另外,以景观视角研究水利,突出的是水利在区域景观塑造中的作用,以及水利工程在当地景观中的核心位置,而在景观的形成与塑造过程中,人是推动这一切的背后核心动力,人活动于景观之中,也影响、改变着景观的形成与走向。没有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维持,不会有各种基于水利工程而形成的民众生活场景;但如果没有人,水利工程也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人是景观中最关键之元素。

(作者耿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讲师;邮编:650091)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李桂芝)

can always coordinate. Yet they are in a state of coop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R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 Inquiry into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Governance // Liu Wei

The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tes” and “law” and between “rule by rites” and “rule by law” have changed from the one on antagonism to the one that emphasizes fusion and hybridity in modern tim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analys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conceptual settings an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riginal forms of these concepts in “rule by heaven,” “rule by virtue,” “rule by rites,” “rule by punishment,” and “rule by man,” and of principles of Chinese governance including “rule by heavenly principles,” “behave by virtue,” “rites as law,” “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the law,” “man as the essence.” All these element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 and hav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original legal principle. All above constitute the “r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core is the rule of virtue and rit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rule of taking 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law and treating man as the essence. It was thus concluded as “rule by rites” by later generations.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ushibian Movement // Li Changyi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s proposal for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ushibian (debate o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Gu Jiegang was inspired by Liang Qichao’s articles, such as *A Narrative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New Historiography*, *Observ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History* and *Treatise on the Trends in Chinese Geography*. He established the “accumulation theory”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n proposed “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was of one single origin” and “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territory was always of one unitary who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Bo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ucius by Gu Jiegang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Confucius by Feng Youl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Liang’s works such as *Protecting Confucianism as a Religion Is Not Showing Respect for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After that, the focus of the movement turned to exami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Liang Qichao furthermore had impact on Hu Shi who argued that “classical schools of philosophy did not originate in officialdom” and Luo Genze who investigated the origins of these various schools through his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Therefore,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dvocated by Liang Qicha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ushibian Movement.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 Geng Jin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follows several approaches, that is,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 and the ecological aspect.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dopts water conservancy as the entry point through which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state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egion. The ec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combines perspectives from both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regional hydr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present different paradigm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with prominent research outcome. However, a focus on research paradigm tends to underplay the value of detail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needs to show more complex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behi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introduction of landscape history is an excellent attempt to broaden the horizon and diversify the approaches of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in China. It returns to focus on “water conservancy,” the essence of the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and shows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with water conservancy as being at the core.

The Two Cities by Otto of Freising and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Wang Lihong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 D. was written by Otto, Bishop of Freising. 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work known for its promotion of eschatology. It also stands out in the